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 中国粮食产量、消费与流通*

李若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浮夸、浪费与瞒产使后人无法真正了解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粮食生产情况。在粮食消费上, 浪费是客观存在, 但是粮食消费分配中保护城镇的政策是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的关键因素之一。食堂内部的分配不公也使饥荒进一步加剧, 在饥荒暴发初期继续大规模出口粮食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

关键词: 大跃进; 困难时期; 饥荒; 粮食产量; 消费与流通

中图分类号: C9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639(2001)06-0123-10

1960年是人口损失最严重的时期。这年人均粮食消费164斤, 1961年人均粮食消费159斤, 但是这年人口损失反而远小于1960年。这说明了虽然饥荒与粮食短缺有关, 但是更重要的是粮食的使用与分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对饥荒理论有影响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 发生饥荒是因为作物的歉收及其它使总食物供给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 以致人均食物供给突然降到饥饿线上。但是在对主要饥荒进行分析时, 食物可得性减少仅是一个不完整的解释, 或者是一个没有说服力的解释。森对饥荒的另一个解释称之为“权力失败”解释, “权力失败”有两种, 一是直接“权力失败”, 指食物生产者不能通过生产或购买来满足自己的最低需求; 另一是“购买权力失败”, 指由于需求的突然上升, 价格上涨导致那些原来可以买到足够食物的人无能力买得起食物。森认为饥荒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原因, 而不仅仅是食物短缺的问题。^① 森的理论从对粮食生产、分配、消费这一链条的权利出发研究饥荒,^② 对了解我国困难时期有启发, 不过也应该意识到其在解释计划经济体制中问题的局限。

一、粮食产量问题

* 收稿日期: 2001-06-27

作者简介: 李若建(1956-), 男, 福建厦门人,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① S·加塔克等:《农业与经济发展》, 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第278页。

② Amartya Sen: *Food Entitlement and Economic Chains Hunger in History*, ed. by Lucile F. Newman, Blackwell, 1995, pp389~407

由于浮夸和瞒产，大跃进时期的粮食生产情况只能是估计。当年浮夸是官员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作的一种理性反应，瞒产则是农民为了生存而作的选择。一些官员明白，“少浮夸一点，群众生活就好一点”^①，报产量实际上成为基层官员良心与野心的冲突点。也不乏官员不愿意过分浮夸，甚至为此被批斗，但是这种靠良心而不是靠制度的方法是无法抗拒上级的压力及保护自己官位的利益倾向的。

大跃进之前浮夸风已经存在，1957年甘肃省实际粮食产量是315万吨，而宣布数字为425万吨。^②大跃进时浮夸风登峰造极，粮食产量是主要的浮夸内容，小麦的亩产吹到7000斤，水稻的亩产吹到10万斤以上。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估计并正式公布全国粮食产量将达到6000~7000亿斤，1958年底又把粮食产量夸大到8500亿斤（42500万吨），比后来公布的20000万吨多出112.5%。^③

表1 各地的粮食浮夸情况

地区	浮夸产量(万吨)	实际产量(万吨)	多报幅度(%)
甘肃	1000	339	195.0
河南	3510	1265	177.5
河北	2250	837.6	168.6
安徽	2250	885	154.2
湖北	2250	987	128.0
江苏	2000~2500	1110	80.1~125.2
浙江	1600	789	102.8
四川	4500	2246	100.4
福建	885	445.5	98.7
广西	2290	1170	95.7
青海	110	58.6	87.7
湖南	4500	2455	83.3
贵州	900	525	71.4
山西	750	462	62.3
内蒙古	590	423	39.5

资料来源：各地方志、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等，由于册数多，不逐一列出。

浮夸相当普遍，但是程度有所差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浮夸严重的地区正好是后来人口损失惨痛的地区，如安徽、河南、甘肃。从整体上看，沿海地区的浮夸风相对内陆地区会小一点。粮食产量的夸大，是导致错误决策的一个因素。因为粮食征购是与产量相关的，浮夸越多就意味着征购越多，而过度的粮食征购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最典型的是广西环江县，这个县在1958年放了一个水稻亩产13.04万斤的全国最大的“卫星”，但是在困难时期饿死1.9万人。^④

①《淮阴50年史》，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②《甘肃省志》（第三卷），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页。

③《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④《当代中国的广西》，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国家公布的1958与1959年的粮食产量都是简单的整数，说明是一个估计数，这个数是后来薛暮桥和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在浮夸数字上核减出来的。^①如果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粮食数量相加，与全国的数字有相当大的出入。1958年各地粮食产量合计数是1.89亿吨，比全国公布的2亿吨少0.11亿吨，少5.5%。

1958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丰收年，然而大跃进中的劳动力使用不当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导致了大量的粮食浪费，损失了许多应该收获的粮食。把劳动力抽去大炼钢铁，使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一些成熟的粮食没有收上来烂在地里，导致粮食减产。在浮夸最突出的河南省，到1958年11月6日止，50%的棉花没有收上来，红薯和花生只收了70%，粮食虽然已经收上来但打了场的只有60~70%。^②四川省估计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10%，估计此项浪费的粮食在220万吨以上。^③陕西在1958年抽调180多万农村劳动力炼钢铁，只剩下老弱妇孺搞秋收，造成当年全省粮食损失10%左右。^④江西德兴县1958年抽调万余劳动力去大炼钢铁，导致12万亩晚稻只收割10%，17.9万亩冬种计划只完成27%，到1960年全县人口外流4.7万人，占全县15.8万人的29.7%。^⑤当时山西农民说在田间劳动是“女的多男的少，老的多年轻的少，小脚女人多大脚女人少，带孩子的女人多不带孩子女人少”。当时有几首顺口溜生动描写了这种情形：“禾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⑥。“豆子熟了满地跑，棉花开了摘不了”^⑦。“高粱放了哨，玉米上了吊，豆子放了炮，棉花挂了孝”^⑧。

作为谋生的本能，1958年秋收过后农村普遍发生瞒产私分的风潮。由于认为农民瞒产，一些干部到农民家查抄粮食，那时基层干部的一些恶劣行为与反瞒产相关。^⑨反瞒产的主要对象之一是相对富裕一点的农民，有的地方在反瞒产中提出的口号是“向富裕中农要钱要粮过年”、“打倒富裕中农”，组织“建设社会主义贫农团”。^⑩四川合川县培训了6400多名干部，组织5万多人的“清产”大军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反瞒产斗争。^⑪农村干部本身也被上级怀疑，1959年在广东开展了反瞒产运动，一些农村干部被迫承认瞒产，有些可能是真的瞒产，而有些则是被冤枉。广东雷南县集中全县生产小队以上干部4千余人开大会，迫使交代瞒产私分粮食700余万斤。^⑫四川省涪陵地区在1959年开展的“反瞒产”运动中，规定每个生产队都要完成一定指标的瞒产数，最后落实“瞒产”5.27亿

①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页。

② 新占修：《浮夸忧思录：不应忘记的悲剧》，《中国统计》1995年第2期。

③ 《当代中国的四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④ 《陕西省志·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40页。

⑤ 《德兴县志》，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⑥ 《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82页。

⑦ 《河北省志·劳动志》，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⑧ 侯欣佳：《山西粮食40年》，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⑨ 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冬季号。

⑩ 《当代江西50年》，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页。

⑪ 《重庆市农业志综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馆藏1995年，第99页。

⑫ 王琢、许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

公斤。在这场运动中，大批农村干部被打、撤职、关押劳改，甚至被打死。当时情况之悲惨，以致1964年“四清”运动中，一些农民不诉解放前的苦难，专门讲当时自己如何被打、被斗、家破人亡。^①四川昭觉县1960年的“反瞒产私分”中，把问题上升到“在粮食问题上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斗争”，运动导致自杀和凶杀事件78起。^②一些官员也有瞒产，1962年青海省海西州官员承认他们在1959年4月至1961年4月中，全州共隐瞒粮食877万公斤。^③

二、粮食消费问题

为什么1961年的粮食产量和1960年基本持平，而1961年饥荒情况会好转；还有1961年各地的人口死亡率与各地的自然灾害有明显的相关，而1960年就没有这种相关。^④这里就有一个粮食消费分配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保护城镇的政策可能是根本的症结，同时在食堂内部，干部的多吃多占也是一种分配不公。虽然当年中国是财产最平均的国家之一，但是一种在生存线上的平均，有一点消费不均就可能导导致悲剧。在粮食高度短缺的情况下，如果两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可能两个人都活下来，而如果一个人稍微多吃一点，可能另一个人要死亡。

1959年全国平均每人消费粮食373斤，1960年降到327斤。1959年全国平均每人消费食油4.5斤，1960年降为3.7斤。1959年全国平均每人消费猪肉6斤，1960年只有3.1斤。^⑤大跃进前的1957年，中国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是2167千卡，1960年下降到1535千卡；蛋白质从58.5毫克下降到41.7毫克；脂肪从25.4毫克下降到16.6毫克。^⑥与1957年相比，1960年平均每人每日摄入热量下降了29.2%，蛋白质下降28.7%，脂肪下降34.6%。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人每天需要2385千卡的热量，但是在1959年河南省农村平均每人每天只有1923千卡的热量，^⑦只有所需标准的80.6%。更为严重的是1960年河南粮食产量比1959年减少9%，1961年又比1960年减少22.8%。如果以粮食产量来推算，估计在1961年，河南农村平均每人每天不足1500千卡的热量，大约只有所需标准的60%。如果上面的数字是真正平均分配的话，就是大家都吃不饱，也都饿不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人民公社初期农民还是喜欢食堂的，在食堂门口的对联也许是这种心情的体现：“食堂巧煮千家饭，公社饱暖万人心”^⑧、“鼓足干劲加油干，放开肚皮吃饱饭”^⑨。有观点认为，农民欢迎公共食堂的原因与粮食统购统销有关，因为在每年春夏粮荒农村进行粮食

①《四川农业合作史料》，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507~510页。

②《昭觉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③《海西藏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④李若建：《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影响》，《当代中国史》2000年第5期。

⑤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2页。

⑥Basil Ashton et al: *Famine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No. 4, 1984.

⑦《中国人口·河南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42页。

⑧《古城村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9页。

⑨《黄滩村志》，中国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返销时，常常是有粮和无粮的农民都叫缺粮，真假难分，干部群众往往争吵不休，办了食堂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强调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农民自然拥护。^①但是食堂是强制农民参加的，在有的地方规定不许农民自己做饭，谁家房顶冒烟，就搜查他家的粮食和食品，捣毁其幸存的炊具。^②

有观点认为大跃进时期公社食堂的消费是非理性的，存在大量的浪费，因此导致了困难时期的灾荒。有的公共食堂在半个月就吃了3个月的口粮，^③黑龙江省肇源县平均每人日耗粮食1.25公斤，^④大体上比正常的消耗多一倍。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甚至提出“有粮大家吃，有地大家种，有钱大家用”^⑤，这样更加剧了粮食的浪费。

1959年底全国办公共食堂392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口约4亿，占人民公社社员总数的72.6%，但各地的比重有较大的差异，一些在食堂吃饭的人民公社社员比重高的地区，是人口高死亡率的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安徽、河南等，但是也有一些人口死亡率高的地区，在食堂吃饭的人民公社社员比重不高，如甘肃和山东。把各地1959年底在食堂吃饭的人民公社社员比重与各地1960年人口死亡率作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43 ($P < 0.05$)，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相关，但是只能解释各地死亡率的部分差异。

表2 1959年底全国各地在食堂吃饭的人民公社社员比重(%)

东部		中部		西部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地区	比重
北京	87.4	山西	70.6	四川	96.7
天津		内蒙古	15.7	贵州	92.6
河北	74.4	吉林	29.4	云南	96.5
辽宁	23.0	黑龙江	26.5	西藏	
上海	94.5	安徽	90.5	陕西	60.8
江苏	56.0	江西	61.0	甘肃	47.7
浙江	81.6	河南	97.8	青海	29.9
福建	67.2	湖北	68.2	宁夏	52.9
山东	35.5	湖南	97.6	新疆	85.1
广东	77.6				
广西	81.0				

资料来源：《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人民公社食堂对饥荒的影响，恐怕更多的不是食堂建立初期的非理性消费，而是食堂无法保障农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到1960年相当部分食堂的供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960年底河南25.8万个农村食堂库存不足200万吨，绝大部分食堂吃粮标准不到每人每

①《重庆市农业志综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馆藏1995年，第97页。

②《武都县志》，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9页。

③《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④《黑龙江省志·总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⑤《当代中国的湖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页。

天6两。在一些食堂按照每公斤米加16公斤水来煮粥,^①其营养价值所剩无几。四川长寿县有的农村食堂2个月没有见到一粒米,以致有人出工后就倒在地里死了。^②湖南一些地方农民把公社食堂称为“死堂”,^③大跃进时期河南信阳地区关于公社食堂的一首顺口溜为:“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④。武都县关于食堂的顺口溜是“口号满天响,制度贴满墙,只好喝清汤”、“鸡不鸣,狗不叫,妇女不生娃”。^⑤

表3 1960年河南农村食堂吃粮标准

标准(公斤/人)	0.38	0.34	0.31	0.28	0.25	<0.25
食堂(个)	430	772	41829	105448	99490	10325
比重(%)	0.2	0.3	16.2	40.8	38.5	4.0

资料来源:《河南省志·人民生活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除了浪费粮食之外,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食堂是被农村基层干部控制的,而一些干部的行为是很差的。^⑥把粮食都集中在食堂,扣饭成了农村干部惩罚农民的手段之一,就有农民因为被扣饭而致死。^⑦干部及家属也利用特权在食堂多吃多占,用一个被周恩来称为“第一个敢讲真话的人”的河北农民的话说就是“司务长、炊事员多吃点,他们的孩子老婆爹娘老子多吃点,干部再多吃点,还能剩几两”。^⑧

大跃进初期城市也同样存在粮食的浪费。

1958年12月1日开始,广东省江门市对粮食供应实行凭证不定量供应,但是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到1959年4月就恢复粮食凭证定量供应。^⑨当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时候,许多城市已经几乎没有库存,1960年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1960年6月北京、天津和辽宁的10个主要大城市的库存粮食几乎没有,只能维持不到10天的供应,上海的大米库存已经没有,天天告急,^⑩就是在情况相对比较好的新疆乌鲁木齐也一度只有3天的存粮。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一些产粮大省继续维持高征购,使农村付出极高的代价。

从1960年开始,3年内大规模下放2500万城镇人口,减轻了政府的粮食负担,同时减少城镇人口的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中央发出压缩城乡口粮供应标准的决定,淮河以南农村人均口粮全年每人平均360斤原粮,淮河以北农村人均口粮全年每人平均300斤原

①《田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1页。

②《重庆市农业志综述》,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馆藏1995年,第101页。

③蒋崇武:《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40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④李新:《四清记》,《中共党史资料》(6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⑤《武都县志》,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19页。

⑥李若建:《大跃进时期基层干部行为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冬季号。

⑦《达县市北外乡志》,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服务中心馆藏1998年,第114页。

⑧《河北省志·农业志》,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⑨《江门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

⑩《国史通鉴》(二),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粮。除了特殊的工种之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减少 2 市斤成品粮指标。为了减少粮食被人冒领和享受超过标准的情况，中共中央于 1961 年 6 月指示全国 183 个城市对人口和粮食供应进行一次普查核实。^① 实际上一些地方的城镇居民口粮标准已经非常低了，例如当时的广东澄迈县干部、教师、市民和小贩每月口粮标准是 15 市斤。^②

三、粮食流通

在粮食消费上存在的分配问题只是导致饥荒的一个因素，如果把粮食的征购、贸易、进出口、储存和运输作为流通渠道来研究的话，可以看出这一渠道存在许多问题。

大跃进中农民承担了巨大的压力，1958 年农民的农业税的征收额从原定的 412 亿斤提高到 428 亿斤，实际征收了 445.7 亿斤，比 1957 年增加了 11.4%，比 1956 年增加了 21.5%。税只是农民上缴粮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统购粮。如果把征购后又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扣除，剩下的是净征购。1958~1960 年的粮食的净征购率都超过 20%，这里主要是当时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加大的结果，但是也存在着浪费。例如 1958 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 1957 年增加了 7.8%，而粮食净征购量却增加了 23.2%。

各地粮食征购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差距明显在缩小，在同时有 1957 年与 1959 年资料的 11 个地区中，大跃进前的 1957 年变异系数（标准差/平均值，系数越大表示差异越大）是 0.22，1959 年下降到 0.13。中国各地农村的情况相差很大，有的地方有较多的粮食可以出售，有的地方则自己种的粮食连自己吃饱都成问题。而当时把各地征购水平拉近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导致一些地区农民自己留下的粮食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

表 4 1957~1963 年全国各地粮食征购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 (%)

项目	1957 年	1958 年	1959 年	1960 年	1961 年	1962 年	1963 年
全国	29.0	33.4	42.3	35.3	26.8	24.8	24.7
河北	22.4	31.5	44.9	35.0	25.6	16.0	17.9
山西	19.6		35.5				
吉林	36.1	50.7	53.3	60.5	51.0	40.3	36.5
浙江		38.0	40.0	35.6	33.4		
安徽		39.4	50.6	35.9			
江西	20.8	29.2	33.3	28.6	27.8	24.9	26.2
河南		30.0	37.2				
广西				42.2			
四川	30.8	31.2	48.9	46.2	38.8	29.2	27.0
贵州	23.3	31.9	46.6	50.6	29.4	26.2	25.9
陕西	33.2	33.3	40.7	38.7	35.1	29.1	29.2
甘肃	27.0	31.1	43.0	31.2	25.8		
青海	27.0	39.6	46.9	44.0	21.9	16.3	17.3
宁夏	37.1	37.3	48.1	33.2	30.0	18.0	18.7
新疆	32.4		42.9				

资料来源：同表 1。

^① 《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4~117 页。

^② 《澄迈县大事记》，海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5 页。

粮食征购过多，农民生活困难，1960年每个农村人口占有212公斤原粮，还有许多地区农民人均占有不到200公斤原粮，扣除种子之外人均口粮就更少。贵州省粮食征购后1959年与1960年农业人口人均占有粮食152公斤和111公斤，1960年不得不回销粮食110万吨，相当于征购量的68.75%，^①由此可见过分的粮食征购和大量的粮食返销也导致大量的浪费。

江苏宝应县在1959年征购过度。该年农民人均口粮只有76.5公斤，月平均6.4公斤，导致饥荒。^②饥荒中出现大量弃婴，在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县城内捡到927名婴儿，其中死婴153人。^③山东陵县的一个公社，实际粮食产量只有875万公斤，浮夸成2216万公斤，因此要强行征购粮食575万公斤。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农村干部入户翻粮食，全公社80%的农户被翻。1958年这个公社有50018人，在1960年上半年这个公社死亡2280人，外流6847人，浮肿病6547人。^④河南杞县将农民的147万公斤口粮作为余粮征购，导致一般农民每日口粮只有0.25公斤。^⑤四川的渠县，由于1961年的过度征购，到1962年春全县83个乡有38个乡没有一粒存粮。^⑥

返销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这个保障体系的效率是不高的，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的1954~1957年，中国农村并没有完全杜绝饿死人的事件。^⑦由于有返销，农民对过量的粮食征购勉强可以接受，这可能是大跃进时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接受过量的粮食征购的重要原因。可是这种保障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浪费，例如1959年贵州省修水县统购1176万公斤粮食，然后返销579万公斤，^⑧返销将近统购数的一半。另一个是返销要在统购完成后才能进行，存在一个时间滞后。在困难时期农民盼望的返销没有及时来到，结果导致饥荒严重，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在国内粮食紧张的情况下大量出口粮食，对饥荒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在1958与1959两年，中国出口了大批粮食，特别是1959年出口的粮食达到416万吨，并且几乎没有进口粮食，当年出口的粮食占总产量的2.4%。在饥荒严重的1960年依然净出口了265万吨粮食。从1961年初开始中国大量进口粮食。^⑨

当时中国拒绝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援提议，^⑩出于爱面子，一些地方官员甚至对上级的援助都要拒绝。1959年秋上级供应四川省巫山县375万公斤粮食，而县委居然组织基层干部讨论“自己生产未搞好，要不要国家供应”，1960年2月发动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粮食，用社会的存粮安排生活，以保证不要国家粮食供应。^⑪1960年安徽凤阳县饥荒严

①《中国农业全书》（贵州卷），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②《当代中国的江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③江渭清：《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④王贵家：《农村经济典型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⑤《杞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2页。

⑥《中国国情丛书·渠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⑦《中国国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第267页。

⑧《修水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⑨《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⑩Basil Ashton: *Famine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0, No.4, 1984

⑪《巫山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重，蚌埠市一位凤阳籍的副市长从蚌埠市运5千公斤豆渣支援家乡，竟然被县、公社领导拒绝。^①

农产品减产导致物价迅速上升，从1957年开始物价逐步上涨，以1961年的涨幅最大，到1963年物价才开始回落。1962年全国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57年上升了25.7%，1962年食品价格比1957年上升了34.7%。同期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下降11.8%，实际平均工资下降27.9%。因为在国营商店里的商品基本上是定量供应的，而这些商品又包括了城镇人口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所以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只能反映部分情况。如果从集市贸易价格指数来看，价格上涨是相当大的，物价最高的1961年，集市贸易价格指数是1957年的4.5倍。

在困难时期粮食可以在黑市上买到，只是价格高得惊人。江苏省1961年在集市贸易上消费品价格指数比是1960年的4.43倍，而粮食则是13.53倍，食用油是10.26倍。^②当时在集市上一个烧饼一元钱，也就是说一个普通职工的工资还买不到50个烧饼。在集市上，蚕豆要论颗卖，一元钱只能买50~60粒蚕豆。^③

当时国家的粮食储备是不能轻易动用的，甘肃省张掖地区在1959年底出现饿死人事件，地委向省委请示动用国家粮库救灾，但省委指示在第二年2月前不许开仓放粮。^④1960年大城市粮食短缺，特别是核工业基地严重缺粮，周恩来亲自找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要求调粮食，安徽在1960年春夏的青黄不接时调出2.5亿公斤大米。^⑤四川省在困难时期是一个重灾区，而正是这个灾区调出了大量的粮食支援城市和其他地区，1958~1960年间，四川调出的粮食是57亿公斤。因为本地有饥荒，有些地方官员对粮食外调不热心，江苏省要求淮安县调出5千公斤粮食，县委书记想把外调数减少1.5~2千公斤，为此被地委领导带到南京向省委负荆请罪，因为不堪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导致这位书记得了精神分裂症。^⑥由于粮食短缺，不得不用高昂的代价把边疆地区的粮食调出来。当时四川省从少数民族地区调出的粮食，其运输成本是销售价格（国家牌价）的10倍，^⑦云南省一些山区运粮所需的劳动力比生产粮食的成本还高。^⑧

四、讨论

虽然困难时期的饥荒存在森所说的两种“权力失败”，农民没有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也没有能力买粮食；城市居民除了定量标准之外，一般是买不起市场上的高价粮食的。但是用森的理论看待困难时期的饥荒产生就有几个问题不好解释：（1）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

①《凤阳县志》，方志出版社，第32页。

②《江苏省志·价格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

③李子超：《当代中国价格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④《张掖地区粮食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⑤江鲲鹏：《曾希圣‘左’后纠‘左’》，《人物》1997年第5期。

⑥《淮阴50年史》，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⑦《四川省志·粮食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⑧《云南省志·粮食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导致食物减少；(2) 困难时期存在的粮食调配，是牺牲农村来保护城镇，这是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才能做到的事；(3) 困难时期的粮食价格是双轨制的，一方面是高得惊人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是基本上保证城镇人口不会饿死的最低水平的廉价食物供应；(4) 虽然在困难时期有不少所谓的“投机倒把”，但是没有出现一个囤积居奇的商人阶层。

从各地 1960 年人口死亡率的标准回归方程（见表 5）中可以得到两点启示：(1) 粮食使用不当是影响人口死亡率的重要因素，在公共食堂吃饭人口比重越高，死亡率就越高。(2) 对粮食减少程度的预期不足。从方程中可知人均粮食产量对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不大，而减产幅度的影响却十分明显，这表明由于对粮食减产的预期不足，在粮食减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是导致各地人口死亡率差异的重要因素。

表 5 各地 1960 年人口死亡率的标准回归方程

自变量	模式一		模式二	
	β	T	β	T
1959 年在公共食堂吃饭人口比重	.434	2.91***	.468	3.073***
1960 年人均粮食	.279	1.68*	.064	.314
1960 年比 1957 年粮食减产幅度	.635	3.89***	.531	2.561***
R^2	.442***		.458***	

说明：①模式一包括北京、天津与上海，模式二不包括北京、天津与上海。

②*表示 $P < 0.10$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

(责任编辑 许玉兰)

Grain Output, Consumption and Circulation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Hard Times

LI Ruo-jian

Abstrac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Hard Times, the grain output was a mystery because of the trend to boast and exaggerate the achievements, waste of food and concealment of the grain output. The government guaranteed the food supply to the cities, so the public canteens wasted a lot of food. Thus the famine became even more serious. The increasing amount of export of food during the period caused more population loss.

Keywords: Great Leap Forward; the Hard Times; famine